


朗、叙利亚、上合组织等各方的关系时与在处理国际能源事务上，不顾美国的反对，越发坚定维护自身利益和安全，坚持推行独立自主的多元平衡外交，持续推行“向东看”政策。

第四，地区国家将加速本国发展转型，重新寻找适合自身政治身份定位的新战略。在本世纪经历过痛苦的20年战争与冲突后，中东国家开始痛定思痛，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埃尔多安执政下的土耳其是较早开始这一探索的先行者。如今，沙特、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与埃及等国也紧随其后，开始探索更符合本国国情且兼容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现

代化发展之路。

第五，大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博弈进入新阶段，“一超多强”加速向多极化方向演变。拜登政府曾明确宣布将阻止中俄在中东“填补权力真空”，并采取各种措施阻挠地区国家与中俄合作，但拜登政府的这一目标连连受挫。目前，虽然美国仍在该地区维持着霸权地位，但其中东秩序新架构、地区盟友体系和红海—海湾地区安全政策均面临重大挑战，地区国家离美、远美倾向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在过去十年里，俄罗斯通过介入叙内战全面重返中东。虽然目前俄面临美西方制裁等不利因素影响，与

地区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合作障碍增多，但其中东政策基础仍较为坚实。同时，中国虽然面临美国的打压围堵，但在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2022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沙特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外界普遍将之称为“三环峰会”。这些峰会的成功举行，与中方成功调解沙伊矛盾，不仅是中国中东外交的重大突破，也是中方在中东对美斗争取得两个回合的重大胜利。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发展与治理中心主任）

沙特、伊朗矛盾根深蒂固的历史经纬

文 / 刘中民

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的矛盾根深蒂固，它不仅是中东政治的结构性矛盾，更承载着阿拉伯民族与波斯民族、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千余年的历史恩怨。了解沙伊矛盾的历史经纬，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沙伊和解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千年恩怨之始

尽管伊朗和沙特作为现代国家的历史都不足百年，但双方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却已有近1400年之久。作为伊朗前身的波斯帝国最

早可追溯至由居鲁士大帝建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330年），该王朝后为马其顿帝国所灭，随后伊朗进入希腊化时期。公元3世纪，波斯人又建立了强大的萨珊王朝，而灭亡萨珊王朝的正是在公元7世纪崛起的阿拉伯帝国。

波斯人在皈依伊斯兰教后，选择了该教两大派别中的什叶派。在伊斯兰教中，占据主流的逊尼派与处于边缘地位的什叶派最初的核心分歧在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哈里发（即继任者）的产生方式：逊尼派主张通过推选的方式选择贤能担任，什叶派

则主张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为首位合法的哈里发。

在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王朝（公元661~750年）时期，波斯地区在帝国内处于边缘化地位。在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时期，伴随着帝国中心从大马士革东移至巴格达，当时在文明程度上更加先进的波斯人在阿拉伯帝国的官僚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在后世的逊尼派保守派和激进派看来，正是波斯人深入阿拉伯帝国内部并对其进行“腐蚀”，才使帝国偏离了伊斯兰教的“正道”，并最终导致自

身的衰落与灭亡。这也是伊斯兰教逊尼派中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派视什叶派为背离宗教正统的“忤逆者”的历史原因。

1258年，阿拔斯王朝为蒙古帝国灭亡后，阿拉伯世界和波斯地区均进入混乱的地方王朝割据时期，直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453~1923年）崛起并征服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区。在这一时期，波斯地区相继建立了萨法维王朝（或译萨非王朝，1501~1736年）和恺加王朝（1779~1921年），萨法维王朝还确立什叶派支派十二伊玛目派为国教。1925年，恺加王朝被巴列维王朝取代。而在阿拉伯半岛，沙特家族自18世纪以来一直谋求建立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独立国家，并最终通过与瓦哈比派结盟，在1932年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传统君主制国家，即沙特阿拉伯王国。沙特作为麦加和麦地那的“两圣地守护者”，自立国起就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领袖自居，并强烈反对什叶派。

矛盾总体可控的初期

1932~1979年，沙特与伊朗之间虽存在诸多矛盾，但双方关系总体可控，并未发生严重冲突。

1929年，为实现相互承认，伊朗与沙特进行谈判，但由于沙特的伊赫万组织毁坏了与什叶派—波斯关系密切的圣墓，引发双方对抗，伊朗因此拒绝承认沙

特。但在1932年沙特阿拉伯王国正式建国后，伊朗和沙特还是建立了外交关系。

由于宗教分歧，沙特和伊朗很快便在上世纪40年代陷入第一次断交危机，后在美国的调停下实现复交。此外，彼时伊朗对尚未独立的巴林还提出了主权要求，遭到沙特的强烈反对，双方在海湾地区争夺主导地位的斗争初露端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处事谨慎的沙特与美国的关系并不密切，甚至在美英倡导建立“中东司令部”、筹划巴格达条约组织等问题上表示抵制，反对美国建立中东军事集团和集体防务体系。而伊朗则在西方于1955年建立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正式加入，此举遭到沙特的批评。彼时伊朗巴列维王朝国王竭力推行的世俗化政策也引起了沙特的反感。

走向全面对抗的十年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推翻巴列维王朝后，新建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推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内外战略。彼时伊朗把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视作“输出革命”的首要对象，导致沙伊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层面，沙特和伊朗展开相互攻讦。伊朗伊斯兰革命精神领袖霍梅尼认为，沙特的君主专制不符合伊斯兰教的精神，应通过伊斯兰革

命予以推翻，同时还否认沙特具有“圣地保护者”的地位。同样，沙特也强烈指责霍梅尼的伊斯兰教是“异端”。在现实层面，沙特和伊朗围绕“输出革命”与“抵制革命”展开了全面对抗。1979年，沙特东方省的什叶派抗议沙特王室并引发严重暴力冲突和骚乱，而科威特、巴林的什叶派抗议示威活动也十分活跃。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下，沙特等国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日益崛起，进而对国家安全构成严峻威胁。

同时，伊朗向伊拉克“输出革命”是两伊战争（1980~1988年）爆发的重要原因。尽管沙特与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复兴党政权之间也存在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的矛盾，但面对“伊朗威胁”，沙特选择支持伊拉克。据统计，在两伊战争期间，沙特向伊拉克提供了高达300亿美元的援助。在沙特的领导下，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还于1981年成立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其重要目标就在于防范伊朗，维护集体安全。此外，在1979年的阿富汗战争爆发后，面对伊朗向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不断扩张，沙特通过与巴基斯坦合作，采取了支持阿富汗塔利班势力的政策，其目的之一仍是制衡伊朗。

在双方不断走向全面对抗的背景下，沙特与伊朗又一次断交。1987年，402名朝觐者在沙特麦加发生的一次冲突中丧生，其

伊拉克战争令双方再陷对抗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地区的形势急剧变化、教派矛盾日趋严重。2011年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地缘政治矛盾与民族矛盾、教派矛盾叠加，导致沙伊矛盾再度加剧，双方关系重回全面对抗状态。这一时期的沙伊矛盾与对抗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伊拉克战争爆发至所谓“阿拉伯之春”发生前。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国确立了本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随后，美国克林顿政府采取了“西促和谈，东遏两伊”的中东政策，使伊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维持了相对平衡。但在9.11事件后，美国相继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严重破坏了海湾地区的力量平衡，导致伊朗与沙特的矛盾激化且走向战略对抗。在美国发动这两场战争后，彼时能够制衡伊朗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被美国推翻，伊朗战略环境显著改善并迅速崛起，这一势头令沙特倍感忧虑。此外，在伊拉克战后重建的过程中，深受伊朗影响的伊拉克什叶派成为该国的主导力量，这使伊拉克成为所谓“什叶派新月带”的枢纽。与此同时，2002年伊朗核计划的曝光及其核技术开发的不断推进、2005~2013年内贾德任总统期间伊朗推行的强硬外交、美国奥巴

伊朗驻沙特大使馆原馆七年来的首次开门。

2023年4月12日，伊朗代表团抵达沙特首都利雅得筹备重开使领馆事宜。图为伊朗驻沙特大使馆原馆七年来的首次开门。

中包括275名伊朗人。愤怒的伊朗民众冲击沙特驻伊朗大使馆，导致一名沙特外交官丧生。1988年4月，沙特宣布与伊朗断交。

伊朗主动改善关系

1989年霍梅尼去世，哈梅内伊继任伊朗最高领袖。在1989~1997年的拉夫桑贾尼总统执政期间，受国内经济困难与两伊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伊朗在对外政策上有所缓和，并把改善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作为首要任务。在1990年伊朗与伊拉克恢复外交关系后，伊朗于1991年与沙特实现复交。此后，伊朗与巴林、卡塔尔、科威特等国的关系也得到改善。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中，伊朗也坚持中立立场，避免激化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

1997~2005年，改革派人士哈塔米两届连任伊朗总统。在他执政期间，伊朗对内推行经济与民主改革，对外通过推进“文明对话”缓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1997年6月，哈塔米在首次赢得

总统选举后不久便致函沙特国王法赫德，表示伊朗愿承办伊斯兰会议组织（伊会组织）第八次首脑会议。同年12月，伊会组织首脑会议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成功召开，沙特王储阿卜杜拉亲王代表法赫德国王出席会议。同时，该组织50多个成员国的30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东盟秘书长马吉德等国际组织领导人参会。这对伊朗改善国际形象、打破外交孤立并重返国际舞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后，伊朗和沙特的高层往来不断增多。例如，1998年2月，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访问沙特；1999年5月，沙特第二王储苏尔坦亲王访问伊朗；1999年5月，伊朗总统哈塔米访问沙特，这是自1979年以来伊朗总统首次访问沙特。高层的频繁互访也极大促进了双方经贸与文化交流的发展。1998年，沙特将伊朗的朝觐名额从六万人增加到8.5万人；中断15年之久的德黑兰至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的航班也得到恢复；双方还签订了在经济、贸易、投资、教育、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协定。

马政府对伊朗政策的趋缓，都极大地刺激了沙特的战略焦虑。

第二阶段始于2011年。在该阶段，双方的对抗具有阵营化、教派化和代理人化特征。一是阵营化。2016年，因沙特处决什叶派教士尼米尔，沙特与伊朗又一次断交。2017年，沙特因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也与其断交。围绕这些问题，多个阿拉伯国家选择追随沙特，与伊朗、卡塔尔断交，并参加沙特领导的反恐同盟。伊朗则被认为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也门胡塞武装、巴林政治反对派等什叶派力量扩大地区影响，这使中东国家日渐分化成分别以沙特和伊朗为核心的两大阵营。二是教派化。在也门、巴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沙特和伊朗被外界普遍认为分别支持着逊尼派

和什叶派力量，这导致沙伊对抗和地区热点问题的教派化，并成为也门冲突、叙利亚冲突等地区冲突程度加剧的原因之一。三是代理人化。沙特与伊朗本身便被外界认为分别具有美国和俄罗斯“代理人”的色彩，而两国在中东内部又各有“代理人”，这使也门、叙利亚冲突等问题陷入“代理人竞争”，进而导致地区热点问题久拖不决。

中国全球安全倡议的成功实践

自2021年以来，在中东地区形势总体趋于缓和的背景下，在内政外交上陷入战略透支的沙伊双方出现关系缓和迹象，并在伊拉克进行了多轮对话，但始终未能取得突破。随着近年来中国与沙特、伊朗高层的频繁互动，中沙、中伊

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加深，叠加中国与两国长期友好、相互信任，这使沙伊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最终在北京实现和解。

尽管沙特和伊朗有改善关系的内生动力，但中国无疑为双方复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中国在2022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的一次成功实践，其遵循的核心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沙伊和解不仅带动了海湾乃至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缓和，而且正在改变长期以冲突对抗为特征的地区政治格局和战略特征，使中国长期推动的和平发展、协商对话、包容互鉴等外交理念和实践成为地区国家的共同选择，并有望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地区潮流。^[7]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中国的中东外交政策日益成熟

文 / 余国庆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这一对“中东夙敌”宣布复交，对中东地区而言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但对中国来说，这表明经过70多年的耕耘，我国的中东外交政策已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奋发有为，并日益成熟。

从总体超脱到有所作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奉行

“一边倒”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的外交政策，中东国家并非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优先对象。在1955年4月举行的万隆会议上，中国支持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亚非拉国家开展反帝反殖民斗争，埃及、叙利亚、也门等多个阿拉伯国家在此后与中国建交，中国中东外交初现成就。上世纪70年代，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阿拉伯一大片”为中国恢复在联合

国的合法席位提供了有力支持。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中东国家迎来了一波建交高潮，到1992年已与所有中东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从总体来看，在冷战期间，中国虽不干预中东国家内政，但对中东地区事务也没有太多参与。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中东外交政策转向以能源安全和经济利益为主导，同时避免深度卷入